

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壘三吴，清江一水，都缘君、当年小住。
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寄，一粟天地，长江东去，更没几个风流人。
叹当年、小贾孤客，处忧患、惯看秋月春风。谁念生、自应笑我，一事无成空老去。
但愿、对酒时、屈指三秋而已。

苏轼《卜算子·黄州中秋》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壘三吴，清江一水，都缘君、当年小住。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寄，一粟天地，长江东去，更没几个风流人。叹当年、小贾孤客，处忧患、惯看秋月春风。谁念生、自应笑我，一事无成空老去。但愿、对酒时、屈指三秋而已。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壘三吴，清江一水，都缘君、当年小住。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寄，一粟天地，长江东去，更没几个风流人。叹当年、小贾孤客，处忧患、惯看秋月春风。谁念生、自应笑我，一事无成空老去。但愿、对酒时、屈指三秋而已。

丁永淮 梅大圣 张社教 编注

武汉出版社

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

丁永淮 梅大圣 张社教 编注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注.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430-1561-6

I. ①苏… II. ①丁…②梅…③张… III. ①苏轼(1036~1101)—文集

IV. ①I214.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629 号

编 注:丁永淮 梅大圣 张社教

责任编辑:廖国放 肖德才

封面设计:应 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34 字 数:620 千字 插 页:1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注说明

一、本书全编的作品，是丁永淮先生1982年为迎接在黄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而主持组织收集的。当时参与收集、抄录、寻找资料并初步编成集的，除丁永淮外，还有李振波、胡发智二位先生。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当时主要依据《东坡七集》（《四部备要》本）、《东坡全集》（《四库全书》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清同治刊本）、《东坡乐府》（中华书局本）、唐圭璋《全宋词》、明人编撰的《黄州集》、清蕲春学者陈诗的《东坡居士居黄考》（孤本），参考了《东坡志林》（中华书局本）、《仇池笔记》（华东师大点校本）、陈迹冬《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刊本）等书。这次，我们——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重编并注释时，以孔凡礼先生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刊本）和《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刊本）为底本，但略去校勘记。在吸收其校点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孔校所未用而有价值之刊本，作出新的校点。词以《东坡乐府》（中华书局版）为底本，参考了石声淮、唐玲玲先生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大出版社版）、刘尚荣先生校证的《傅幹注坡词》（巴蜀书社版）等著作。同时，还从苏轼留下来的手迹及地方志书中辑录一部分佚文。在编注中，丁永淮先生提出了总体思路、编辑体例，并注释了部分篇目；梅大圣先生潜心三年，注释了绝大部分篇目；张社教先生协助梅大圣先生做注释工作，表现了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丁永淮、梅大圣先生审定了全部书稿。

二、本书为苏轼黄州作品汇编，上限为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下迄元丰七年（1084）四月七日别黄州。但为了反映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全貌，收集了苏轼元丰三年正月一日离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赴黄州的途中，如陈州，以及别黄州过江后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创作的诗歌。苏轼离开黄州后所写的有关怀念、回忆黄州的作品以附录形式收入。

三、本书先原文，后注释。编排顺序，略仿《东坡七集》，诗居首，词次之，文在后，而书信别列一大类，佚文在注中说明。王文诰《苏文忠诗编注集成总案》及朱祖谋《东坡乐府》未曾编年的，我们尽量依据各方面的材料，进行编年，一律在注释[1]中说明。待考的作品，根据有关数据推测或列于编年作品中间，或列于编年后。在注释中，我们选用了一些前人评语，如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汪师韩《苏诗选评》、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等。

四、为了读者全面了解本书，我们收进了丁永淮先生已发表的《苏轼黄州活动年表》。

五、本书卷首的文章，由梅大圣先生撰写，代作前言。

一九九五年九月

在困顿中建立“平生功业”的成功范式

——兼论黄州时期的东坡居士形象

(代前言)

梅大圣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多。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这儿，他的人格精神得到升华，他的人格表现显示了智能的光辉。关于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创作，治中国古代思想史与中国文学史者多有精深研究。本文仅就苏轼黄州时期的“功业”有关问题略陈鄙见。

苏轼在海南儋州谪居三年后遇赦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回到镇江，游金山寺，给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那么如何看待苏轼“平生功业”？按照传统意识，苏轼“平生功业”的建立期，应该是在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以及杭州、颖州等高官期。袁枚所说的苏轼功业大抵就是如此。他说：“人有以诗重者，亦有诗以人重者。古李杜韩苏，俱以诗名千古，然李杜无功业，不得不以诗传，韩苏有功业，虽无诗，其人亦传矣，而况其有诗乎！”（《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苏轼在这首诗里所说的功业观显然与一般人的认识相悖。这既是政治自嘲，是其苦难屈辱一生的真实写照，又是对传统的功业观所做的新的审视、新的人生价值判断。可是，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他始终眷恋的人世。苏轼是一位充满政治热情而又脚踏实地地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家，凭着他的仁者胸怀和聪明才智，已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政绩，赢得了千载之下人民的怀念。过去的高官生涯，鲜花也曾簇拥过他，但仍频繁触犯世患，以致刚直难伸，抱负落空。如今廉颇老矣，抚今追昔，才算真正进入庄子心如死灰，身若不系之舟，于无何有之乡遨游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庄子本人难以实现，此前的苏轼也无法达到。不是不想达到，而是势不能：“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有了这种人生境界，才能对“平生功业”作出新的审视。回顾过去的征途，究竟算建立下什么功业呢？没有。倒是在黄、惠、儋三州，建立了他的功业，实现了人生成功。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

苏轼所谓“平生功业”，我认为，就是指他在这些贬谪之地的作为。正是在贬谪生活里，苏轼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真淳朴厚的感情，自食其力的可贵。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文中反映了出来——同情生民疾苦、揭露政治黑暗、

反对民族压迫、进行自我批评……他觉得这才可算是一生中对国家做了些真正好事。(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6月版)

苏轼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追求，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今人亦多有启迪。这样，黄州时期就成了苏轼建立“平生功业”的第一站。苏轼在困顿的黄州时期，不仅没有忘记承担人生的责任和义务，而且适时且成功地调整了生活方式，进入了一种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艺术人生境界。我们认为，苏轼在黄州建立功业的实践过程的审美意义在于，开创了士人在困顿中建立功业之路，提供了于背逆之际注重精神追求，实现人生成功的范式。

首先，在困顿的黄州时期，苏轼始终保持“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与李公择》）的坚定信念和自强不息地追求“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的人生价值目标。

我们知道，“生命里的一切有成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不可能全部满足我们所有的本能或欲望，因此生命必然是有取也有舍，有顺也有逆，有向也有背，有有为也有有所不为。如是生命在致曲中求诚就必须靠内在权能的自克或强制作用了。”（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一场有哲学序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生命处在逆境建功立业，靠的就是理想、信念和顽强不垮的内在精神。若在恶劣环境里自暴自弃，或撒手尘寰，不仅毁灭了早年选定的理想目标，也毁灭了自身。苏轼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他的母亲程夫人对其直道死节之志的培养教育，使他终生受益。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又云：

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之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于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

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使他的人格精神在经历人生炼狱般的磨难而贬斥黄州后，没有被政敌击垮，相反得到了升华。他重新内省过去的功业观。而对人生的价值观念有了更冷静、更深沉的思考。《雪堂记》里有两句话高度准确地概括了他在黄州的苦苦追求，那就是：

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

《庄子·天地》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了。”机，即机心，智巧变诈的心计。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深受小人“机心”之害，故苏轼坚决反对。关于“非逃世之事”的含义，就是指在困顿的黄州时期要承担人生的责任和义务。杨胜宽先生在《苏轼人格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做了这样解释：

第一，努力追求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不因任何挫折而放弃，这就需要有矢志不移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生活意志。第二，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和义务，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具体过程，磨炼生活意志的具体表现。倘若一遇挫折就退让逃避，那是对邪恶的妥协。第三，人生的事业是多种多样的，生活的价值并不限于一个尺度。只要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做出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都会显示出生命的宝贵价值。

苏轼就是这样在困顿的黄州时期，把“非逃世之事”当作实现人生的价值目标。他以“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杜甫作为在困穷中人格精神的楷模。他并与在“乌台诗案”中受牵连而贬到宾州的王定国称引杜甫气节共勉：“杜子美在固穷中，一饭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与王定国》）他的好友李公择对他的处境深表忧虑，他却在《与李公择》中表达了坚定的信念：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患得丧，付与造物。

《与滕达道》中，他庄严地表示：

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

又说：

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这是何等的胸怀，怎样的人格力量啊！忧世精神和参与意识，是受过孔子熏陶与影响的中国士人共同具有的基本人格特点和人格精神。然而，遇到政治打击而遭贬，或退居江湖后，往往把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座右铭，又是中国士人普遍的心理状态，并视为高风亮节。他们虽然在远其祸、善其身的原则下，也尽可能做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曹植语）的事，但毕竟很有限，像苏轼那样蹲过朝廷的大牢，而后流放黄州的政治犯，如此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政治信念不动摇，对社会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以特殊的方式热心参与，是前无古人的。因而，这也就成为苏轼人格精神的突出特点。我们且看他的人格表现：

他在贬所黄州听说官军收复失地，大破西夏军，至为兴奋，为之击掌高歌：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闻洮西捷报》）

元丰五年正月，他于东坡之胁，葺堂五间，名曰“雪堂”。他身居雪堂而心想天下事：“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道山清话》）他也“爱杜牧之《华清官》诗，自言几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同上）他之“咨嗟叹息”不寐者，乃在于深深地为国事忧虑，希冀国家尽快摆脱外患内忧、积弱积弊的窘境，迅速地强盛起来。这些记载，很真实地揭示了苏轼在逆境中可贵的“许国心犹在”的精神。他在黄州以仁者的情怀，流惠黄州人。他的生活本来很艰困，在《答秦太虚书》中说：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然而，当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消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连忙写信给朱寿昌太守要求革除陋习（《与朱鄂州书》），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黄鄂之风》）黄州时疫流行，他向巢谷苦求圣散子药方，“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效。”（《圣散子叙》）他种麦东坡之上，恰逢大雪盈尺，乃丰收之兆，可是他忧虑雪中的百姓：“舍外无薪米者，亦耿耿不寐，悲夫！”（《书雪》）正是这高尚宽厚的仁爱情怀，使他身处厄境，而尽力地为黄州人办好事，“不以大小为之。”（《与王定国》）这些正是黄州人对他有无穷之思的原因。

苏轼在黄州不仅具有坚强的信念，而且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在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说：“夫天岂以刚故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愉，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东坡易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正是在这种信念和自强不息精神支配下，他辛勤读书写作，每晚三更后方入睡，从而使他的艺术才能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充分利用闲居的时机与空间，大量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使其弟苏辙“瞠然不能及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居黄期间，苏轼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最为辉煌的成就。四年多的时间，他创作词约六十六首，诗二百多首，三篇赋，文一百七十多篇（含小品），写了书信二百八十多封。关于它们的风格特征，我在《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和创作》（见拙著《苏轼黄州诗文评注》，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中，论之颇详，兹不赘。这里要介绍的是王兆鹏先生1995年7月在全国第八次苏轼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苏轼贬居黄州期间词多诗少探因》新见。王先生根据《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东坡乐府编年笺注》（石声淮、唐玲玲笺注，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统计，得出“相对而言，贬居黄州时期，是苏轼一生的创作历程中词

作最多而诗篇最少的一个时期”的结论。盖其原因在于：“一、‘乌台诗案’后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写诗。”“在危机四伏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东坡‘不敢’写诗文，有时又不能不写。于是，他不得不改变创作路数，不得不注意防范被罗织陷害的策略和方法。……导致了东坡黄州时期诗歌产量的下降和风格的改变。”二、“词属游戏文字，作‘小词不碍。’”“苏轼虽然是把写词当‘游戏’，但却严格遵守‘游戏’的规则，他玩得认真而投入；如果是漫不经心地‘游戏’，他就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名篇杰作。”

在黄州，苏轼在清静的环境里，着力于学术研究。他以顽强的毅力手抄了《金刚经》，又第三次手抄了《汉书》，同时成就了父亲苏洵之志，写了九卷《易传》、五卷《论语说》。这次系统地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探讨，是一种有别于孩提观书、青春苦砚的钩深致远，达到了“君子不以命废志”（《东坡易传》卷五）的思想高度。这对于他此后的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人格发展的走向，产生于深远的影响。他还继续培养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像李方叔、李委等一批年轻诗人、学者。

所有这些，都属于苏轼的黄州功业。“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苏轼靠矢志不移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黄州揭开了在困顿中实现人生成功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其次，由于第一点，苏轼在黄州困顿时期，运用他的哲学智慧成功地调整了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完美、最切实、最生动地展示了东坡居士形象，而成为东坡文化精神的象征，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所仿效。同时，他的黄州功业也在这新的生活方式中得到艺术的实现。

如果认为苏轼是旷达的乐天派，因而在黄州心境淡泊，随遇而安，没有矛盾，没有痛苦，那是不切实际的。他除了经济生活十分艰苦外，政治环境也非常险恶。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能随意外出行游。他说：

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

未脱罪籍，身非我有，无缘顶谒山门。（《与圆通禅师》）

恨谪籍所磨，不克千里会葬。（《与徐得之》）

他有满腹牢骚：“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云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迁居临皋亭》）此时，苏轼进而产生强烈自悲感。他发自内心地说：

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与蔡景繁》）

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同上）

某说谪居粗糙，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答李寺丞》）

以上足以说明苏轼遭贬黄州，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构成了一个十分沉重的情结。在这样的际遇中，要说他真正做到随缘任命，委顺自然，不忧愁抑郁可能吗？心直口快的苏轼是如此地袒露心肠：

处患难不戚戚，虽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

问题是如何对待降临的不幸。若让忧愁不加节制地延伸扩大，就会在郁闷中中断送一切，包括功业在内。苏轼聪明和成功之处，就在于善于通过自克结构，排遣消解苦闷忧患。这有两种途径。一方面，从《答案太虚书》和《黄州安国寺记》等作品里看出，他或者冬至后在天庆观道堂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或者“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做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宗教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标准，在苏轼身上发挥了作用，帮助他调整内在价值结构、提高人生道德境界，从而排遣了心灵的压抑，恢复心理平衡。他的修炼，还包括著名的“三养”。《避暑录话》云：“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而往还者亦多贫，复杀（杀，减削）而为三。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在《与子由》信中，我们看到了他厚自养炼，深自省察的体会。他说：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胜别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有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

显然，苏轼的“尽凡心”，既与《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尽心”相通，又带有浓厚的禅心色彩。他要拂去笼罩在心头那些不利修炼养性的烦闷忧愁等因素，进入“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我们不能把它视为苏轼的消极堕落，而是苏轼经过儒道的互补，在困顿的时期，使自己所具备的仁性关怀进一步发扬光大，道德境界也升华到另一个成熟的佳境。这样，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真正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余秋雨《苏东坡突围》，《收获》1993年第3期）从此，他也找回了一个真正的自己。

另一方面，那就是他适时地调整了黄州的生活方式。这是在困顿中战胜困厄悲凉的命运，建立功业的重要途径。其生活方式的转换，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在与黄州人建立休戚与共的和谐关系中，消除了由谪贬带来的沉重哀伤，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得到了生命的源泉。他与黄人的交往是艺术的往来，因而其黄州功业在与黄人艺术交往中得到艺术的建立。苏轼由于幼时得到浓厚的仁性修养，再加上家庭环境，尤其是祖

父疏达不羁、与人为善、宽厚长者品德的影响，使他素来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人缘极佳，特喜结交。《蓼花洲闲录》载：

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常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可见，苏轼为人真诚坦率，胸无城府，结交的原则是不分身份贵贱、门第等级，只要彼此间有坦诚与理解。此前，他结了不少忘年交、年齿交，不乏真诚与友爱；但是，由于他没听从弟弟子由与爱妻关于“择交”的劝告，结果真的也有故人背叛他，甚至排挤迫害他。经过岁月的检验，苏轼也分清了清浊。他说：“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之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之人也。”（《刚说》）到黄州后，不少故人患有世态炎凉综合症：“我滴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又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叔书》）然而，苏轼并不因此就离群索居，而是以“泛爱天下士”之爱心，以坦荡的胸怀去广泛接触黄州各阶层中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文化素养的人士，去寻觅人间的情谊。叶梦得《避暑录话》这样叙述：

子瞻在黄州及岭南，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矜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

这里看不到官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荡漾着的是朴质、真诚、风趣、纯洁的美好情谊。苏轼感到是那样的亲和与温暖。难怪他于登州还朝写给黄州友人的信中说出这样充满感激的话：“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与潘彦明》）那么，苏轼这种生活方式的转换，展示了什么样的生活境界？它所呈现给后世文人士大大的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又有何特点？我们感到，除了苏轼在黄州人的帮助下，像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亲自参加劳动，以解决“乏食”之急，展现了东坡躬耕形象外，尚有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在与黄人广泛社交中，以诗酒风流的方式，创造了文学的辉煌成就，也展示了旷适的东坡居士形象。

我们翻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即可发现，苏轼在与黄州人交往的诗词文中，带有不少“饮”、“酒”、“醉”诸字。苏轼原不会饮酒，“尝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彭乘《墨客挥犀》）可是，随着仕途沉沦荣辱、人生交际不断变化，到黄州后他的酒量增大：“吾少年望见酒

盞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题子明诗后并鲁直跋》）而且酒瘾相当惊人。《饮酒说》云：

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门自馺。（《书东臯子传后》：“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

这里，苏轼陈述了他那量小而瘾大、“一点红表现无边春”的“半酣”式的饮酒方式，其目的在于一个“乐”字，即与友人一道去追求精神的酣适。这与迷狂式酒徒之饮是有本质区别的，亦与历代大诗人酒道相异。刘扬忠先生在《酒趣·诗心——从苏轼的饮酒看其文化性格》（中国第八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对中国古代大诗人在饮酒中展示的文化性格做了比较分析：李白“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偏重饮酒的狂豪之兴；杜甫“浊醒谁造汝，一酌散千愁”（《落日》），注重的是以酒浇灭愁思；白居易“勿嫌饮太少，且喜欢易致。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效陶潜体诗》），已开始注意到饮酒该追求“适”的境界，而不以多为贵。苏轼饮酒比上举诗人“都文雅，心思更细腻，感觉器官的灵敏度更高，对饮酒的体认更意味深长。他从来都反对泥醉，而主张‘半酣’，以真切地进入飘然欲仙的恬适畅达之境。”所以，“东坡饮酒，不是为了逞口腹之快，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健与豪壮，而只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适’。这个‘适’字，是东坡式的酒境的主要特征。”同是饮酒风流，今日的黄州与过去的官场内涵不一样。那时也有饮酒风流，但更多的是为了官场酬应，左右逢迎，而现在的黄州诗酒风流中洋溢的是与黄州人之间的理解、友爱与温馨，是在“半酣”中，以艺术家兼哲学家的心灵摄捉人世间的真情，摄取大自然的真美。于是，一篇篇佳作，一首首华章，在他的诗笔下生成，从中获得陶冶和美感。他在《跋草书后》说：

仆醉后，乘醉辄作草书千数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

《侯鯖录》亦谓：

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

黄庭坚有一段话很形象地描述苏轼诗酒风流的情景：

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过四五合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诗味，真神仙中人。（引自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酒，的确成了苏轼在黄州酝酿艺术精品的催化剂。可以这样说，苏轼在黄州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词作，在题材、内容、风格、特色上，呈现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景象，与苏轼和黄州人共同营造的富于黄州地方特色的酒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苏轼在《与李方叔》信中感触地说：

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

苏轼进入半酣式的酒境中，短暂地沉浸在乐陶陶的艺术天地里，艺术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内外交养所形成的艺术潜象与潜力，使他创造出一个个清空的艺术境界，塑造了至今活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旷达特质的坡翁形象。诗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去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正月三日点灯会客》、《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等；文如《记与安节饮》、《书临皋亭》、《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游定惠院》等。至于词则更多了，如《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等。于是，具有旷适特质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形象、“夜饮东坡醒复醉”后，独立江边，“倚杖听江声”的形象、春夜行于薪水中“解鞍欹枕绿杨桥”的形象、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与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醉翁形象，等等，皆从这些艺术精品中呼之欲出。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这样，在纷扰的浊世，一位文艺全才在与黄州人交往中，那种洒脱忘机的东坡先生形象，在他的诗酒风流中豁现出来了。

第二，在与黄人的交往中，运用戏谑，即幽默的力量，拉近了与黄州人的感情距离，活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的形象。

苏轼并不是与生俱来就富于幽默感。其幽默感是在他人人生旅途中形成而不断发展的。最早表现出幽默特性是他监官告院、任职直史馆时期。他以幽默为斗争武器，为创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竭尽全力地做着清洁工作，表现他的坦直率露、嫉恶如仇的个性及人格。苏轼随着多次政治生活的挫折，通判杭州，出任密、徐、湖三州太守期间，将幽默初步运用于改善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到了“乌台诗案”发生后，被谪居黄州，苏轼开始收敛起毕露的锋芒。内心情绪抑郁不平，导引他进一步培养和发挥了他的幽默感和幽默力量，来增进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从中体认生命的宝贵、生活的美好。（参阅刘尊明《论苏东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内蕴》，《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我们试看几例黄州时期苏轼幽默故事：

庞安常是今湖北省浠水县名医，善医而聋。苏轼不识，因到沙湖相田得疾，遂往求治。一见面苏轼便“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是日，剧饮而归。（《游沙湖》）苏轼“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此为何名？主人对以无名。坡又问：‘为甚酥’？坐客曰：‘是可以为名矣！’潘长官以坡不能饮，将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着水也。’他日，苏轼忽思油果，作诗求之。”（《为甚酥》）《侯鯖录》谓：张吉老过生日，请坡夫妇饮。适有新桃，食之见双仁。坡戏作献寿诗云：“终须跨过玉麒麟，方丈蓬莱走一巡。敢献些儿长寿物，蟠桃核里有双仁。”《墨庄漫录》中说：苏轼常与客居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的四川老乡王文甫相戏：“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

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墨庄漫录》又云：“（陈）季常喜谈养生，自谓吐纳有所得。后季常因病，公以书戏之云：‘公养生之效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鸚鵡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西清诗话》载东坡戏陈季常畏内柳氏：“东坡因诗戏之曰：‘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如此等等，幽默风趣，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幽默也运用到与歌妓的调侃上。苏轼“平生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茶余客话》）这种风流天性与宋朝文人士大夫喜歌舞、善音律、酷好声妓的文化氛围是同步合拍的。《春渚纪闻》谓“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侍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礼。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一日）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五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罗素说：幽默的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从上所引几则幽默的故事，我们似乎明白了，苏轼在与黄州人的交往中，喜幽默，动辄嬉笑，是为了在困顿中抚慰创伤，抵御精神和情感的孤独，体味人生的乐趣。他的智慧光彩也在与黄州人的戏谑中闪耀，且丰富了他乐天派的性格。

第三，苏轼在与黄州人的交往中，往往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展示出在困境中观赏大自然、从中体味人生之适的境界。

中国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十分亲近，总是想办法在自然中安顿自己的身境和心境。但是，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却很不同。金谷宴集的名士们，是带着一种占有者的心态，让自然在他们的宴乐生活中增添一点情趣，使他们过于世俗化、过于物质化的生活得到一点雅趣。兰亭修禊的名士们，是把山山水水看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比起金谷名士来，当然要亲近得多。但是，他们仍然是欣赏者。他们站在自然面前，赏心悦目，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感情的满足。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参阅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苏轼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不同于金谷宴集和兰亭修禊的名士。他一生仰慕陶渊明，晚年于儋耳给弟子由写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然而，苏轼又不能等同于陶渊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

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同上）由于苏轼这一特殊的人生遭际，他与自然的关系，与陶渊明那种“山川田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的自然观也是有别的。苏轼所追求的是“适”境：

寓居临皋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尝有此适。（《与王庆源》）

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予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人，好客而喜游，闻予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返，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古黄州名）三年，不知其久也。（苏辙《武昌九曲亭记》）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风，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

“适”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苏轼对自然有着睿智的观察思考，通过对人生进行内省体验，实现主体与客体间的亲和谐调，去细细咀嚼和发现自然中愉悦自身之美而安适，进入“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的无思之思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人生崇高需要的满足。

黄州赤壁、安国寺、承天寺是苏轼与友人常游的地方。尤其是赤壁，当年面临大江，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代表苏轼黄州创作最高成就的“三赋”（前、后《赤壁赋》）一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这儿创作的。黄州不仅有赤壁诱人的风光，而且长江南岸武昌西山，以及浠水兰溪、蕲春天峰麓、黄梅五祖寺等风景名胜，风雨云月，阴晴朝暮，千姿百态。苏轼和他的黄州友人时而拄拐杖、携酒食，布衣芒鞋，出入阡陌间，留下足迹和回声，可谓一路风情一路诗，至今禅宗五祖大满禅师弘忍创建的黄梅五祖寺还刻有苏轼潇洒俊逸、清新可辨的“流响”二字：时而荡双桨、泛扁舟，与友人浩浩乎飘飘乎于长江之滨，纵情享受风月之所赐。

总之，苏轼在困顿的黄州岁月，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深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山山水水皆可适。

第四，苏轼在与黄人的交往中，注意研究烹饪艺术，特制了东坡菜和东坡小吃，“为中国烹饪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辉煌灿烂的饮食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数一数二的重大贡献。”（丁永淮《东坡菜与东坡小吃》，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

贬居黄州时期，是苏轼制菜、作点、酿酒最多的时期。据丁永淮先生《东坡菜与东坡小吃》统计，东坡菜凡六十六类，其中三十五类为黄州时期所研制，七种东坡酒中就有东坡蜜酒、“压茅柴”酒在黄州酿成。每道菜，每种小吃的创制，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一首通俗的诗歌，渗透了苏轼生活方式转移后，与黄州人亲密和谐的情谊。他吃了黄州的猪肉，有感于黄州百姓不会制作，特地写了《猪肉颂》教黄人烹饪：“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于是，“东坡肉”成了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传统名菜。他吃了黄州的鱼、黄州的笋，赞不绝口，且近百次去樊口，同在那里开酒店、以打渔为生的好友、诗人潘大临以武昌鱼佐酒，并对闻名遐迩的武昌鱼进行考察，创制了东坡鳊鱼(武昌鱼)、东坡鲫鱼、东坡鳊鱼、东坡笋等名菜，又作《鳊鱼》、《煮鱼法》、《鱼蛮子》等，留下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属浠水)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鳊鱼肥”（《浣溪沙》）等优美诗句；他吃了相传住在安国寺好友参寥和尚为他做的油酥食物和今湖北省鄂州市西山庙里的僧人用西山特有的菩萨泉水和面炸的油饼，觉得味美，于是研制了赤壁东坡饼、西山东坡饼，作《杂记》：“油煎饼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如今“东坡饼”为湖北著名的传统小吃，驰名国内外。可以说，苏轼在黄州所从事广泛的饮食研究，为使他制作的菜成为我国具有独特制作技艺、独特风味的东坡菜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如果九百年前的苏轼地下有知，看到洋洋大观的东坡菜系风靡全国，深受人们的喜爱，将会聊以自慰。因为，他在黄州困顿时期，着力发掘、弘扬的祖国饮食文化变成了社会财富，造福人类，从而也构成了他“平生功业”的一部分。

苏轼在黄州困顿时期建立“平生功业”的成功实践，成了他黄州生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是苏轼精神的灵魂。正是它，标志着苏轼人生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对于苏轼以后的仕途生涯，尤其是谪居惠州、儋州时期的人生价值选择，提供了范式，因而影响至为重大。同时，它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苏轼自身。它的意义，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在渴望建功立业，而在现实面前碰壁，理想、愿望难得施展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进行人生价值选择，提供了借鉴，具有极大的启迪性。所以，对苏轼黄州困顿时期建立“平生功业”有关问题，予以研究，加以梳理，现实意义是客观存在的。

一九九五年九月